

徐霞客与酒

郭杰 郭旭

(茅台镇人民政府, 贵州 仁怀 564501)

摘要: 对《徐霞客游记》中描写饮酒的资料进行了分析, 真实写照了明代酒文化。明代酒文化内涵极为丰富, 各地民风淳朴, 徐霞客所饮之酒, 多数为朋友相邀或村民所献。徐霞客饮酒有几个特点: 每逢节日, 必定饮酒; 交游广泛, 多为朋友设宴相邀; 以酒御寒疗饥, 偶尔染疾, 也以酒为药。

关键词: 酒文化; 徐霞客游记; 明代; 饮酒习俗

中图分类号: TS971; K928.9; F592

文献标识码: D

文章编号: 1001-9286(2010)11-0095-04

XU Xia-ke & Wine

GUO Jie and GUO Xu

(Moutai Town Government, Renhui, Guizhou 564501, China)

Abstract: The drinking custom described in XU Xia-ke Travel Notes is a vivid portrayal of wine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In the record, wine culture at that time was extremely colorful, people were simple and honest, and XU Xia-ke usually drunk with friends and unacquainted villagers. There were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in XU Xia-ke's drinking: drinking at festivals, drinking at banquet, drinking for keeping out the cold, and drinking for curing the disease occasionally.

Key words: wine culture; XU Xia-ke Travel Notes; Ming Dynasty; drinking custom

徐霞客, 字宏祖, 以霞客之名行于世。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旅行家、文学家。他所著《徐霞客游记》^[1]不但是中国地理学名著, 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游记用日记体裁写成, 不但记述了所游历各地的风景名胜、名山大川, 对于各个地区的民俗风情, 也颇多记述。更为重要的是, 在《徐霞客游记》中, 相当系统地保存了他日常生活的记录。从早晚起居到日常饮食, 靡不记载, 为我们研究和了解明代日常生活提供了极为有用的材料。酒, 在徐霞客的旅行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在旅途孤苦寂寞之时, 可以解乏抒情; 在风景秀丽之处, 或是途中奇岩怪石之旁, 也可饮上数杯; 虽是村醪薄酒, 也不乏情趣; 虽身在旅途他乡, 恰逢佳节, 也是不可不饮的。这不仅仅是徐霞客个人的饮酒记录, 也是明人饮酒风尚的集中反映。所谓管中窥豹, 可见一斑。在这里我们无意于将徐霞客描述为一个嗜酒之徒, 仅仅就《徐霞客游记》(以下简称《游记》)所记录的相关资料,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与分析, 为中国酒文化的研究提供一个小小的注脚。

1 对《徐霞客游记》的分析

现存《徐霞客游记》主要集中在从崇祯九年(1636年)九月十九日至崇祯十二年(1639年)九月十四日, 在这3年的时间里, 有事可系的日期为885天。从《游记》

提供的资料来看, 徐霞客的饮酒活动也主要集中在这一时间段。根据笔者对《游记》饮食资料的归类整理, 徐霞客饮酒次数约为110次。其中, 应朋友相邀者61次, 约占55%; 饮于投宿村民处11次, 占10%; 自沽于市肆者33次, 占30%; 未明言饮于何处者5次, 约占5%。从中可以看出, 徐霞客所饮之酒, 多数为朋友相邀或村民所献, 占到2/3左右。另外, 接受朋友赠物中有酒者13次, 但《游记》未说明何时饮用, 故不计入饮酒次数。这说明, 第一, 徐霞客交游广泛, 走到哪里, 都有友人或为其接风洗尘, 或在其青蚨尽炊粮绝时赠以酒肉鸡米, 这是徐霞客能够完成旅行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 各地虽风俗迥异, 但好客之风在少数民族地区显得尤其热情, 在饮于投宿村民处的11次饮酒记录中, 并没有见到徐霞客支付酒资饭钱的记录, 仅在广东有“与之烟少许, 辄以村醪、山笋为供”(《粤西游日记四》)这样一条记载; 第三, 《游记》中诸如“饮于市”、“索酒于市”、“市酒于市”、“索饮于市中”(均见《楚游日记》)的记载比比皆是, 说明了全国城乡各地酒肆之普遍与明代酒业之发达, 否则, 就算徐霞客旅途之中欲饮薄酒, 亦会无处沽得。

2 徐霞客与酒

2.1 若逢佳节, 岂能无饮

收稿日期: 2010-07-14

作者简介: 郭杰(1986-), 男,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人, 大学本科, 主要从事中国酒文化研究。

节日饮酒,是中国酒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元旦、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节日,是历代较为集中的饮酒日^[2]。从《游记》所提供的资料来看,徐霞客虽身在逆旅,这些日子,也是要饮酒的。为古代节日饮酒习俗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个案。

2.1.1 除夕

崇祯九年(1636年)除夕,徐霞客到了江西永新。他在《游记》中写道:“是日止行三十五里,因市酒肉犒所从三夫,而主人以村醪饮余,竟忘逆旅之苦。但彻夜不闻一炮爆竹声,山乡之寥寂,真另一天地也”。(《江右游日记》)哪怕是入年之时,他也仍在旅途之中。身在“彻夜不闻一炮爆竹声”的寥寂山乡,饮的虽是“村醪”,也能使其暂时忘却“逆旅之苦”,发出“真另一天地”的慨叹。

2.1.2 元宵

崇祯十一年(1638年)元宵,他写道:“晚酌南楼,观龙灯甚盛”。(《粤西游日记四》)饮酒观灯,不亦乐乎!

2.1.3 清明

同年二月二十三日是清明节,他在《游记》中写道:“行魂欲断,而沽酒杏花将何处耶?下午,冯使使之母以酒蔬饷,知其子归尚无期,恹恹而卧”。(《粤西游日记四》)好不容易有人赠酒,竟然闷酌。

2.1.4 端午节

崇祯十年(1637年)端午,他到了广东西北部。“晨起,雨大注,念令节名山,何不暂憩,乃令顾仆入城市蔬酒。余方凭槛看山,忽杨君之窗友郑君子英、朱君兄弟超凡、涂俱至,盖俱读书青萝阁。上午雨止,下雉岩寺,略纪连日游轍;而携饮者至,余让之,出坐雉岩寺亭,杨、郑四君复以柬来订约定。当午,余就亭中,以蒲酒、雄黄自酬节意。下午,四君携酒至,复就青萝饮之”。即逢节日,又处名山,更是不可不饮的。早晨即让仆入城中沽酒买菜,自酌之后,更得数友人相陪,当然连饮。“朱君有家乐,效吴腔,以为此中盛事,不知余之厌闻也”。(《粤西游日记一》)明人何良俊有四方士大夫“饮酒皆用伎乐”^[3]的记载,流俗所及,概不能免。可与徐霞客此条记载相互佐证。当时佐酒伎乐流行者先有弋阳腔,后增太平腔、昆山腔^[4]。此处“吴腔”确指何种,不得而知。从徐霞客“余之厌闻”一语,可以概见其饮酒之风,也是其不同于流俗的宣言。

崇祯十二年(1639年)端午,他到了云南腾冲,与友人同游,“冈东尽处,竹树深密,绿荫袭人,披映心目。其前复起一圆阜,立平畴中,是为团山,与此冈断而复续。冈东村庐连络”。从竹中下,一老人迎入其庐,“具腊肉火酒献。盖是日端午,而老人与李君有故,遂入而哺之”(《滇游日记十》)。有腊肉火酒,尚能尽欢。

端午饮雄黄酒,是一个流传久远的习俗^[5]。徐霞客也

概莫能外。然而,在接着的记述中,他有了新的见解。崇祯十年(1637年)六月十六日,同行的静闻“奄奄垂毙”,“形变语谵,尽失常度。始问之,不能言,继而详讯,始知昨果少瘥,晚觅菖蒲、雄黄服之,遂大委顿极度疲困,盖蕴热之极而又服此温热之药,其性悍烈,宜其及此。余数日前阅《西事珥》,载此中人有食饮端午菖蒲酒,一家俱毙者,方以为戒。而静闻病中服此,其不即毙亦天幸也”(《粤西游日记二》)。可见他对菖蒲雄黄的毒性的认识,是有一个转变的过程的。

2.1.5 七夕节

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初七日,又逢佳节。徐霞客来到了两广交界处。这里的人们“以当中元,益不知乞巧,只知报先,亦一方之厚道也。其时雨阵时作,江水暴涨,余为沽酒浸酌,迨夜拥毡而卧,雨透茅滴沥,卧具俱湿”(《粤西游日记二》)。七夕佳节,就如此度过。

2.1.6 中秋

崇祯十年(1637年)中秋,徐霞客到了广东西北部,“日落西陲,风吼不息,浮云开合无定。顷之而云痕忽破,皓魄当空。参一出所储醪酒醉客,佐以黄蕉丹柚。空山寂静,玉宇无尘,一客一僧,漫然相对,洵可称群玉山头,无负我一筇秋色矣”(《粤西游日记二》)。得此良辰美景,当然无负一筇秋色。然两年之后的今日,则不堪回首也。八月十五日,“是夜为中秋,余先从顺宁买胡饼一圆,怀之为看月具,而月为云掩,竟卧”。与其说是天不与人,不如说是无酒可饮所致。次日,中秋已过,“是夜宿邸楼,月甚明,恨无赏酒之侣,恹恹而卧”(《滇游日记十二》)。“恨无赏酒之侣,恹恹而卧”,寥寥数语,将其内心对酒的期盼完全表露无遗。

2.1.7 重阳

崇祯十一年(1638年)重阳,到云南东部,他写道:“倦于行役,憩其楼不出,作数日游纪。是日为重九,高风鼓寒。以登高之候,而独作袁安僵卧之态,以日日跻攀崇峻不少也”。下午,主人“携菊具酌,不觉陶然而卧”(《滇游日记三》)。总算有酒可喝。

遇到节日,如果有酒可饮,自然是十分惬意。若无酒可饮,就只能长叹了。崇祯十一年(1638年)端午之日,他到了贵州西部地区。“市多鬻蒲艾者。雄黄为此中所出,然亦不见巨块。市有肉而无鱼。余兀坐逆旅,囊中钱尽,不能沽浊醪解愁,回想昔年雉山之乐,已分霄壤”(《黔游日记二》)。因“囊中钱尽,不能沽浊醪解愁”,只好“兀坐逆旅”,“回想昔年雉山之乐”,不觉发出了“已分霄壤”的慨叹。

2.2 朋友相邀,俱表真情

徐霞客在游记中所记述的饮酒场合,多是与朋友共饮,且多是他人置酒相邀。这一方面反映了徐霞客交游之

广,也是因其旅途之中酒难自备所致。崇祯九年(1636年)九月十九日,“为出门计,适杜若叔至,饮至子夜,乘醉放舟”。次日“过看王忠纫,忠纫留酌至午,而孝先至,已而受时亦归。余已醉,复同孝先酌于受时处……饮至深夜,乃入舟”。一日之内,两度饮酒。明日,“入看孝先,复小酌”(《浙游日记》)。3日之内4度饮酒,且多在友人处。

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他到了云南昆明。十月初五至初七日,“日日手谈内署,候张调治。黄从月、黄沂水禹甸与唐君大来,更次相陪,夜宴必尽醉乃已”。次日饮后与黄沂水出西门。十一日“复入内署。盖州治无事,自清晨邀以入,深暮而出,复如前焉”。即是“复如前”,自然有酒可饮。十三日“州尊赴杨贡生酌”。十五日“在州署。夜酌而散,复出访黄沂水。其家寂然,花阴历乱,惟闻犬声。还步街中,恰遇黄,黄乃呼酒踞下道门,当月而酌。中夜乃散”。十六日“余欲别而行,唐君谓:‘连日因歌童就医未归,不能畅饮。使人往省召之,为君送别,必少待之’。余不能却”。二十二日“已乃具酌演优,并候杨、赵二学师及唐大来、黄沂水昆仲,为同宴以饯”。二十四日告辞而行,“晋宁公复具酌于道,秣马于门。时天色复朗,遂举大觥,登骑就道”(《滇游日记四》)。在20天之内,明言饮酒竟达11次之多,其饮酒不可谓不频繁。

崇祯十二年(1639年)六月,他到了云南永昌。初九“开宴亭中,竟日欢饮,洗盏更酌,抵暮乃散”。十一日“禹锡招宴。候马元中并其内叔闪孩识、孩心等同饮”。次日“禹锡馈兼金。下午,元中移酌会真楼,拉禹锡同至。雷风大作,既暮乃别”。十八日,友人俞禹锡“雨中来看,且携餐赏酒”。二十三日下午“赴孩识之招,闪、俞俱同宴。深夜乃别”。二十四日,“绝粮。知刘北有将赴省闹,欲设酌招余,余乃作书谓:‘百杯之招,不若一斗之粟,可以饱数日也’”。二十五日“候刘携酌不至,余返寓抄书”(《滇游日记十》)。也是连日饮于朋友处。

虽常赴友人之邀酌,徐霞客也深知“百杯之招,不若一斗之粟,可以饱数日”的简单道理。特别是在路途之中,随时都有青蚨尽炊粮绝的情况。这时,朋友的邀宴小酌与奉赠酒肉鸡米,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崇祯十年(1637年)十一月初五日下午,“黄以启书札送蔬米酒肉”。次日,“黄君复以酒米蔬肉至,又以手书悬留,俟疾起一晤,辞礼甚恭。余不能决而卧”。初七日,“甫晓,黄君又致鸡肉酒米”(《粤西游日记三》)。3日之内3次赠送酒米,可见徐霞客之困顿也。1638年五月初七日“囊钱日罄……余作书寄式围叔。下午,彼以酒资奉,虽甚鲜而意自可款”(《黔游日记二》)。相赠虽少,亦足见真情。

2.3 土酒村醪 彰显民风

朋友置酒相邀,必是美酒佳酿无疑;就算是自己从市

肆之中沽得,虽酒品不一,对于缓解旅途之艰苦寂寞,亦大有帮助。而徐霞客印象最深的,要算山村人家进献的土酒村醪了。前述崇祯九年除夕所饮之酒,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游记》中类似的记载很多,对于研究不同地域酒文化的差异,颇具价值。

崇祯十年(1637年)四月二十二日,憩于一老妇人家,“姬以饭出,冷甚。时衣湿体寒,见其家有酒,冀得热飞大白以敌之。及以酒至,仍不热,乃火酒也。余为浮两瓯,俱留以待追者……追者同随刘之夫携茶迎余,知刘已相待松柏肆中矣。既见,悲喜交并,亟治餐命酒”(《楚游日记》)。火酒又名烧酒,这说明早在明代,湖南乡间的蒸馏酒酿制,已经很普遍。

同年七月二十五日,投宿主人李翁家,“翁具酒烹蛋,山家风味,与市邸迥别”(《粤西游日记二》)。虽未明言何种酒类,然其“与市邸迥别”,必非凡品。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到了广西南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他写道:“诸峒丁各举缙西流,而渔得数头,大止尺五,而止有锦鲤,有绿鳊,辄驱牛数十蹂践其中。已复匝而缙焉,复得数头,其余皆细如指者。乃取巨鱼细切为脍,置大碗中,以葱及姜丝与盐醋拌而食之,以为至味。余不能从,第啖肉饮酒而已。既饭,日已西,乃五里还至那吝村。登一茅架,其家宰猪割鸡献神而后食,切鱼脍复如前”(《粤西游日记三》)。这里,他虽然仅仅是“啖肉饮酒而已”,却为我们留下了少数民族饮酒习俗的原始记录。

崇祯十一年(1638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到了广西西北部。他记述这里的乡民,“与之烟少许,辄以村醪、山笋为供”(《粤西游日记四》)。一方面说明了乡间酿酒的普遍,同时也说明烟草在这一地区的消费,也是比较常见的。三月十六日,他宿于韦姓家,“其老者已醉,而少者颇贤,出醇醪醉客,以糟芹为案。山家清供,不意诸蛮中得之,亦一奇也”(《粤西游日记四》)。四月十九日,他到了贵州平坝。平坝今日为贵州著名酒乡,早在明时即产好酒。“市小鲫佐酒。时方过午,坐肆楼作记。平坝……中街市人颇集,鱼肉不乏”(《黔游日记一》)。

崇祯十二年(1639年)七月十一日,他来到了云南傣族人聚居的地区。他在游记中写道:“登栏,观火头家烹小豚祭先。令一人从外望,一人从内呼。问:‘可来?’曰:‘来了’。如是者数十次。以布曳路间,度入瓮而酌之饭之,劝亦如生人。薄暮,其子以酒肉来献,乃火酒也。酌于栏上,风雨忽来,虽栏无所蔽,而川中蕴热,即就栏而卧,不暇移就其室也”(《滇游日记十一》)。这是关于傣族人祭祀祖先的记录,同时也表明,傣族人已经掌握了蒸馏酒的酿制技术。十三日“宿于蛮边火头家,以烧鱼供火酒而卧”(《滇游日记十一》)。烤鱼佐火酒,亦为一大享受也。十四日“至早

龙川家……龙川迎坐以待之,其妻女即织紵于旁。出火酒糟生肉以供。余但饮酒而已,不能啖生也”(《滇游日记十一》)。

从这些记载来看,湖南、广西、云南等地省份乡间也已经掌握了蒸馏酒的酿制技术,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否则也不会得到徐霞客这位足迹遍天下尝遍四方美酒的大旅行家的赞赏了。关于蒸馏酒酿制技术的起始问题,学术界仍有较大的争论。然蒸馏酒酿制技术在元代北方各省即已广泛传播,则是学术界的共识^[6]。由上述可知,到明朝末年更是传遍南北城乡各地。

2.4 偶有小疾,以酒为药

酒应用于医疗卫生事业,并不是现代人的发明。中国古代有很多关于药酒的论述,《汉书》就有“酒为百药之长”之说,在医书中更记载有不同疗效的药酒方剂^[7]。徐霞客在艰难的旅行之中,即使偶尔染疾,因为缺医少药,也只能以酒或是简单的药酒应付。从《游记》的记载来看,这也是有效的方法。

御寒疗饥,可说是酒的一大功效。在寒冷之时,有友人“出酒慰寒”,而饥饿之时,则是“出酒沃饥而后饭”(《滇游日记八》)。在进入洞中探查或入浴之前,徐霞客总会饮酒,以为预防也。如“少憩,酒三行,始秉烛以进,过若殿堂者三四”(《粤西游日记二》)。“索酒而酌,为浴泉计”(《滇游日记三》)。“乃沽饮于市,为温泉浴计”(《滇游日记四》)。“温泉当平畴之中,前门后阁,西厢为官房,东厢则浴池在焉。池二方,各为一舍,南客北女。门有卖浆者,不比他池在荒野也。乃就其前买豌豆,煮豆炊饭。余先酌而入浴。其汤不热而温,不停而流,不深而浅,可卧浴也”(《滇游日记八》)。“乃市酒餐于市,而后浴于池”(《滇游日记十》)。酒能御寒疗饥,在进入洞穴或是洗浴之前饮用,也能对某些疾病起到预防的作用。而徐霞客对于某些流传颇广的错误看法,并非深信不疑的。前述关于端午节饮雄黄酒之毒性的认识,就是一例。又如,崇祯十二年(1639年)四月,他来到了云南腾冲,“有数家当南峡,是为湾子桥。有卖浆者,连糟而啜之,即余地之酒酿也……土人言瘴疠甚毒,必饮酒乃渡,夏秋不可行。余正当孟夏,亦但饭而不酒,坐舟中,擢流甚久,亦乌睹所云瘴母哉”(《滇游日记八》)。西南一带,在史籍的记载中,多以瘴疠之地目之,然随着生态环境的变迁,所谓的“瘴疠”便不复存在,自然无需先行饮酒以为预防了。这充分说明了徐霞客的科学精神。

至于饮用药酒的记载,更复不少。“取药煮酒,由西门出,街市甚盛。已由南门大街欲上神冈,复行不及也”(《江

右游日记》)。“予以夜卧发热,平明乃起……乃令顾仆先随导者下山觅酒……是晚,予病寒未痊,乃减晚餐,市酒磨锭药饮之”(《楚游日记》)。这是他饮用药酒的最直接的记载。更有病中饮酒的记录,如崇祯十二年(1639年)二月二十二日,他到了云南西北部,友人何君“特设宴宴余。余以小疾欲暂卧,恳辞不获,强起赴酌”(《滇游日记七》)。然遍查随后几天的游记,也找不出病情加重的记载,倒是有饮酒病愈的记录。七月二十三日,他来到了今云南省保山市,他写道“早,马元真邀饭。以顾奴往玛瑙山,禹锡知余无人具餐,故令元真邀余也。先是自清水关遇雨,受寒受跌,且受饥,连日体甚不安,欲以汗发之。方赴市取药,而禹锡知余仆未归,再来邀余,乃置药而赴之,遂痛饮。入夜,元真辈先去,余竟卧禹锡斋。禹锡携袱被连榻,且以新绵被覆余,被褥俱丽甚。余以醉后觉蒸蒸有汗意,引被蒙面,汗出如雨,明日遂霍然,信乎挟纆之胜于药石也”(《滇游日记十一》)。此处所言之病,非仅为“受寒受跌”,且是“受饥”所致。友人具餐邀酌,携药前往,大醉之后竟然得以痊愈,这也可见酒的非凡功效了。可见酒作为药物在徐霞客旅行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明代酒文化内涵极为丰富^[8],不是这篇小文所能涵盖的。且《徐霞客游记》中关于酒文化的记载,也不止上述数端。如,今日之名酒,多有以地名为酒名者,茅台酒、泸州老窖、青岛啤酒、民权葡萄酒等皆属之。但《游记》载湖南郴州有“醴醪泉、程乡水,皆以酒名”(《楚游日记》)、云南有“以卖浆得名”的“酒店”(《滇游日记十九》)、“酒药村”(《滇游日记五》及《滇游日记十二》凡两见)等,与今日之以地名为酒名者迥异。这里只是做一个探索,更深入的研究有待于后来者、贤者。

参考文献:

- [1] 朱惠荣整理.徐霞客游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2] 郭泮溪.中国古代饮酒习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136-165.
- [3]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八.杂记[M].
- [4] 徐海荣.中国饮食史(卷五)[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146-147.
- [5] 刘军,等.中国古代的酒与饮酒[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5.121.
- [6] 杨印民.帝国尚饮:元代酒业与社会[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7-10.
- [7] 李元秀编著.酒文化与养生[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2.
- [8] 王春瑜.明代酒文化[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